



# 贝特兰：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

□ 张 培 张仕荣



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中国的一名英国记者，也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 报道西安事变

1936年1月，贝特兰来到中国，在燕京大学学习中文的同时兼任英国《每日先驱报》《泰晤士报》等多家报社的驻华特约记者。来中国之前，贝特兰已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贝特兰有缘结识埃德加·斯诺，使他“真正发现现代中国的转折点”，并深受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和爱国热情的感染，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充满同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随后，在斯诺的帮助下，贝特兰经过长途跋涉，历经11天从北京赶赴西安进行实地采访。从12月27日开始，贝特兰进行了异常紧张的44天调查。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他以志愿外语播音员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每晚用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播报新闻，及时准确地向外界报道了西安的真实情况。在掌握了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并与杨虎城、王炳南等人士进行深入交流之后，贝特兰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肯定，称“经过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由于它所表现的责任感和灵活性而增加了新的声望”。

1937年，贝特兰依据掌握的一手资料，迅速整理并出版《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该书客观公正地介绍了此次事变的真实过程及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成为唯一的外国人报道西安事变的专著。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是真正勇于担当的力量。正



詹姆斯·贝特兰（中）在宋庆龄（右）上海寓所

是这次西安之行，使贝特兰有机会接触到一支独特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他决定去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天地——敌后抗日根据地。

## 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友谊

1937年8月，日军侵占北平后，贝特兰和斯诺护送包括邓颖超在内的3名中共党员撤离。9月，毛泽东向贝特兰发出了访问延安的邀请，他成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邀请访问延安的第一位英国记者。驻留延安期间，贝特兰多次与毛泽东深入交谈，针对贝特兰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谈话，后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被人们所熟知。在贝特兰看来，毛泽东虽然不拘礼节，却有一种知识的力量和卓越的威仪。

此后，贝特兰不畏艰险，前往晋南八路军总部和由贺龙领导的120师驻地进行实地采访。在华北战线前沿地区，贝特兰先后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多位中共及军队高级将领，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人产生了由衷的敬佩，被延安的蓬勃朝气深深吸引，更加相信中国抗日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随后，他写出《华北前线》一书，其中对华北战区整体情况和抗日战场部分战役的报道，加深了世界对中国抗战的了

解，坚定了战胜日寇的信心，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他曾非常自豪地说，“我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人”，并发出由衷的感叹，“一个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在苏醒了的中国强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亲眼目睹了八路军所面临的艰苦条件后，未满30岁的贝特兰下定决心，要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事业。

## 参与“保卫中国同盟”工作

1938年，受周恩来的委托，贝特兰需将一份有关八路军伤员医疗需求的报告带给正在香港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的宋庆龄。他前往香港，积极参与筹建工作，作为宋庆龄十分信任的外国助手，贝特兰成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坚定支持者。一方面，贝特兰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负责《保盟通讯》的英文版编辑，依据从华北前线带回的关于伤员需求的第一手报告，向外界全面介绍中国敌后战场医疗工作的现状，准确地描述了前线因缺医少药导致的各种困难和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贝特兰还前往英、美等国大力宣传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揭露日本的战略意图与丑恶本质，不辞辛劳地发表演说，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筹募抗战捐款。

# “中”：中华文化的核心密码

□ 隋云鹏 隋汉武

作为一名中国人，“中”字会伴随我们走过一生。“中”字结构黄中通理、内蕴正大光明，构成了中国、中华、中央、中庸等诸多词汇，为我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实际上，我们每天日用而不觉的“中”字，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密码与基因。

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中”字与天文历法学和数学密切相关。天文历法学是上古时期的最初学问，数学是天文历法学研究的主要工具。先民为了深入研究天体运行规律，提高天文学和历法研究的精度，客观上推动了数学的发展。有学者认为，《论语·尧曰》里面，“允执其中”的“中”即为桀表。桀表或者说圭表作为天文仪器是“求中”的测量工具。立表测影要求表垂直于水平地面，精确辨证方位，因此使“中”字具有了中心、中正、中央等涵义，并进一步发展出中庸、中和等词汇，形成了中国、中华等概念，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居而治之的政治观、中庸中和的哲学观。

可见，“中”字来源于上古天文历法学的科学测量，这一科学技术通过圭表把观象授时、制定历

法、求测地中、居中而治等行为紧密联结在一起，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最核心、最宝贵的知识与科技。因此，尧曰篇里的“允执其中”与《尚书·大禹谟》的“允执厥中”有着坚实的考古学支撑，两个词语里“中”字的本义即指桀表。所以，尧舜禹高度重视“执中”这一事关统治的核心知识，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对此，《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中庸》作为全面总结“中”之思想的篇章，已经将“中”的思想从天文学扩展到政治学、哲学等人文领域。正是由于这个历史传统的深远影响，在宋代之前，儒家对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允执厥中”上；直至南宋时期，朱熹认为应将注意力集中在“道心惟微”上，并以此构建了道统论。实际上，“道心惟微”是形而上，“允执厥中”是形而下，而在上古时期，两者是一体不二的。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儒家十六字心法，代表着儒学的最高成就，是心性之学的源头和最高境界。先民在实践中产生了关于天人关系的思

考，“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思考中最核心的，是将天文引入个体生命的内心，实现个体生命精神世界的天人合一，达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的至善境界，从而创造了中华文化独有的心性之学。儒家尤其是宋儒，认为心性之学的来源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后世有学者认为此尧舜禹十六字相传之心法为伪造，实际上，如前所述，这句话所蕴含的思想有着坚实的考古学证据。在心性之学的范畴里，“人心惟危”是指普通人的精神境界在善恶之间不停摆荡；“道心惟微”是指君子或者圣人的精神境界止于至善且慎微慎独，“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描述的即是圣人所思所虑止于至善不逾矩的精神境界，而精一执中是从“人心”达到“道心”的方法。

圭表不仅是确定方向和节气的工具，也是求测地中、测量大地的工具。先民认为夏至日正午桀表影长一尺六寸、一尺五寸的地方为天下之中。圭表的这一用途历史久

远，战国竹书《保训》记载了周文王临终时向周武王讲述大舜“求中”、上甲微“追中”的古老政治传统，勉励周武王也“求中”而治天下。何尊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记录了周人居中而治天下的政治理想，铭文中也首次出现了“中国”（器物上写作“中或”）一词。周人的这一政治理想最终由周公重测地中，并在此基础上营建洛邑而完成。随着天文历法的兴起和发展，恒星等天体坐标精度也不断提高，为天文大地测量以及航海定位等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相对应，出现了“表里山河”“表海风雄”等词汇。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圭表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赋予“中”的深厚人文精神和历史传统，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基因，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潜移默化地发挥着种种影响，勉励我们心中知善、中正为人、中庸做事、中和养心，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 从考古看文明

“甜”是一种味觉，和“苦”相对。“糖类”作为激发“甜味”的物质，是人类食物中比例最大的营养物，为人体活动提供主要能量。古代的人们为了获得糖费尽了心思；近代的人们为了占有糖更是上演了一幕幕悲剧。到了现代社会，一方面，糖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必需品；另一方面，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糖又被列入了黑名单，许多食品特意标明“无糖”。那么，在历史长河中，糖是如何流传、制作与交易，并一步步从稀罕奢侈品变成日常必需品的呢？

## 糖的流传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便通过自然界中的水果与蜂蜜尝到令人愉悦的甜味。尤其是蜂蜜，在人类的智慧和技术还无法从植物原料中提取出糖的年代，它成为甜味的主要来源。随着对蜂蜜的需求越来越大，人们开始人工养殖蜜蜂。在古埃及和古印度等国度，人们不仅将蜂蜜作为食物的甜味剂，还将它作为祭神的贡品和治疗疾病的药方。此外，植物种子在发芽过程中，一般会产生糖化的酵素，从而把淀粉水解成麦芽糖。一般认为，呈黏稠状的麦芽糖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出来的糖。

与蜂蜜和麦芽糖相比，来自甘蔗的糖则是较晚出现的甜味剂。但蔗糖一经正式生产，便成为甜味之王。甘蔗适宜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其原产地已很难确定。有学者认为，甘蔗最早在远古时期的新几内亚开始人工种植，此后传入菲律宾和印度。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仅仅是直接咀嚼吮吸甘蔗的汁液或者榨取甘蔗后再饮用。后来人们将蔗汁煮沸、冷却后，制成糖球，实现了糖从液体状态向固体状态的转变。

佛教典籍《律藏》记载了古代印度的甘蔗种植以及蔗糖的制造和使用情况，被认为是现今可以确定的制成固体糖的最早文献。据说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位将领在进入印度时，发现了一种“不需要蜜蜂就能直接带来蜂蜜”的“芦苇”。从那时起，可能有极少量的蔗糖被带到欧洲。蔗糖从印度传入阿拉伯半岛后，随着阿拉伯人的向外扩张，以及伊斯兰教的传播，甘蔗的种植和蔗糖的食用开始在地中海区域流传开来。随着十字军东征，欧洲人一方面从伊斯兰世界引进蔗糖成品，另一方面也学会了甘蔗种植和蔗糖提炼技术。但受到降水和温度的影响，甘蔗种植和制糖技术在传播过程中进行得相当缓慢。受产量和运输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蔗糖对于欧洲人来说，是象征财富与权势、极为稀罕的奢侈品，仅在极少数权贵阶层和上流社会中流传，普通百姓是很难接触和享受到的。

## 中国制糖技术

中国是世界上制糖最早的国家之一。根据《诗经》记载，远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懂得利用谷类来制作麦芽糖（饴糖），从而获得甜味剂。从西周开始，历代王朝的史书中都有制作饴糖的记载。其中，《齐民要术》一书记述最为详细。书中所叙述的制作饴糖的方法、步骤等，甚至与现今制作技术基本相同。

根据《楚辞》记载，战国时代，我国南方已经开始种植甘蔗（当时写作“柘”），并从中取得蔗糖。到了汉朝，今广东、广西一带的人们开始尝试通过暴晒、煎煮等比较原始的方式，对蔗糖做粗加工，制成浓度较高、便于储存食用的蔗糖。南北朝时期，种植甘蔗日益兴盛，种植区域更加广阔，技术也有所提高，已经可以将蔗糖制成晶体，但仍十分粗糙，含有许多杂质。

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科技交流十分频繁。其中，印度制糖法的传入对中国制糖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唐太宗有感于印度蔗糖（石蜜）易于保存，取食方便，于是派使臣王玄策前往印度摩揭陀国学习制糖技术。印度先进的制糖技术被王玄策带回长安后，朝廷开始在印度制糖法的基础上试制蔗糖，并成功制出颜色和品质均有所提高的蔗糖。唐高宗时期，王玄策奉命从印度请来10位制糖专家，制出了颜色较浅亮的精沙粒糖，使中国的制糖技术得到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宋元时期，中国制糖技术不断提高，品质也不断改进，制造出一种异常细腻洁白、常被用作诗词素材的糖霜。宋代王灼所著的《糖霜谱》作为我国最早的制糖专著，在理论上对制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技术总结。这一时期，大量的闽、粤移民来到台湾，同时带去了甘蔗种植与蔗糖制造技术。由于台湾气候适宜种植甘蔗，因此制糖业迅速发展，并成为我国主要制糖基地之一。

明清时期，人们在以往制糖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制糖技术和经验，生产出洁白如雪、颗粒晶莹的精制蔗糖。在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中，对这一在当时世界蔗糖生产领域占据



了领先地位的制糖法有详细论述。这一时期，随着中国蔗糖的商品化和世界蔗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蔗糖产量随之增加，并和茶叶、丝绸等物资一同参与全球性的国际贸易。

## 近代蔗糖贸易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各大洲之间的生物物种交换与商品交易空前高涨，甘蔗种植与制糖技术也被欧洲殖民者传播到了美洲。由于种植甘蔗对气候条件和劳动力有着苛刻的要求，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延缓了它作为一种商业贸易作物的发展。随着殖民者将大量非洲劳动力贩运至种植条件十分良好的中南美洲地区，甘蔗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制糖业蓬勃发展，甘蔗产量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蔗糖开始成为风靡世界的商品，其价格也降到平民可以消费的程度，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

蔗糖贸易带动蔗糖走向大众消费市场，不仅给大多数人带来了甜味的巨大欢乐，而且对世界贸易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进程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可以说，在蔗糖的甘甜背后，凝聚着许多人的汗水与血泪。

贸易是国家和地区之间发生关系最重要的纽带之一。近代由欧洲所主导的三角贸易，第一次将欧洲、非洲和美洲真正地联系在一起。而蔗糖贸易，则是三角贸易中最为重要的贸易之一。在三角贸易中，欧洲的工业制品被运往非洲，非洲的奴隶被贩运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等热带商品则销往欧洲。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欧洲通过殖民运动，使美洲的社会风貌、生态环境、人口结构、经济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经营蔗糖的欧洲商人们迅速积累了原始资本，为以棉纺织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蔗糖贸易为欧洲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奴隶贸易，给非洲造成了深重而持久的灾难。种植甘蔗需要庞大的劳动力。欧洲许多殖民国家，尤其是英国，为了生产蔗糖，把数以千万的非洲黑人当作商品来对待，将他们贩运到大西洋彼岸，驱入甘蔗种植园，强制其进行极度惨无人道的劳作。奴隶贸易带走了大量的非洲人口，尤其是正值盛年的青年。据统计，从16世纪到19世纪，被贩运至美洲的黑人奴隶，至少有1000万人以上。这也是非洲很多地区直到现在仍然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奴隶贸易时代已经远去，但拥有天使和魔鬼双重面孔的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如何平衡甜味与健康，恐怕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共同话题和基本难题。

